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译丛

揭示资本主义存在的深层矛盾
描绘资本主义商业的基本特征

真正的资本主义

THE CIVILIZED MARKET

〔英〕伊凡·亚历山大 著

Corporations, Conviction and
the Real Business of
Capitalism

Ivan Alexander



新 华 出 版 社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译丛

真正的资本主义

〔英〕伊凡·亚历山大 著

杨新鹏 易学君 译

何光海 龙胜东

刘鸿基 校

The Civilized Market
Corporations, Competition and the Real
Business of Capitalism
Ivan Alexander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正的资本主义/ (英) 亚历山大 (Alexander, I.) 著; 杨新鹏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1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 The Civilized Market: Corporations, Conviction and the Real Business of Capitalism

ISBN 7-5011-4725-6

I. 真… II. ①亚… ②杨… III. 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现代 IV.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5513 号

The Civilized Market: Corporations, Conviction and the Real Business of Capitalism

Copyright © 1997 by Ivan Alexand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8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Capstone Publishi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真正的资本主义

(英) 伊凡·亚历山大 著

杨新鹏 易学君 译

何光海 龙胜东

刘鸿基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44,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725-6/D·748 定价: 15.00 元

引 言

“美元是清白的。”

——亨利·戴维·梭罗《论公民的不服从》

商业制度——资本主义——笼罩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本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在西方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眼下正在使亚洲富裕起来。争论、不满情绪、经济衰退和有时出现的严重挫折可能使人们对上述事实视而不见，但是商业确实提高了千百万人的生活水平，并因此不仅增加了许多人的财富，而且也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

无论是出于主观意图还是客观使然，生产性公司的“唯物主义”也带来了非物质方面的好处：更舒适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它的另一个好处是为民主提供食粮（尽管它并不构成民主的实质）。

生产性公司这种“唯物主义”还浓缩了空间：占地1公顷的工厂、银行、商店、商业区和办公大楼的产出远远高于大片土地、农场和森林的产出——不是通过扩张方式，而是通过密集化方式。

现在已经很明显，商业制度不会很快被截然不同的

其他制度所取代。它将继续充当生活的外壳，但是它本身不会成为这个外壳的内在之物。原因何在？因为资本主义机制与民主不同，它只是一种程序，而民主则是一种价值体系。

资本主义和商业决不是天然默契的产物。恰恰相反，它们总是激烈争吵、勉强妥协和（如果可能的话）对各方来说都可以接受的参与规则的产物。

资本主义是一系列对立物相互调和的结果：管理者与劳动者或雇员；所有者、持股人或社团与管理者；公司与公司；大公司与小企业；制定政策的公司与制定政策的政府；消费者的利益与生产者的利益；持股人获得高额利润与消费者享有低廉价格；资源利用与保护；成本与社会成本；成功之本与信念之本；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民族文化与贸易和金钱的跨民族性质；垄断或商品供应垄断与竞争；效率必要性与人性必要性；人文主义与博爱精神；平等的公平性与不平等的激励作用；坚定的理性与妥协忍让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即现在个人财富的管理已经获得了公司管理的许多特性。再者，商业制度赖以建立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本书讨论的主题——与其说归功于理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不如说归功于合理妥协所具有的力量。本书将论及这些冲突和矛盾，并对它们加以评述。

所以，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商业制度并不是严密理论的产物。促成商业制度的因素不但包括蓬勃的活力和源源不断的推动力，而且包括忍让和妥协。这些因素将继续对商业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商业不

是一座能实现自我满足的孤岛，它从来就是一个具有经济函数和社会功利衡量尺度的特许机制。

但是，商业制度并没有划定自己在社会或国家关系中的轨迹。即使是仁慈的公司，也没有赋予自己明确的人道主义职能。这种职能一直是由现代政府制定的福利政策来承担的。尽管公司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天然载体，并具有人道主义职能，但是它并没有把这种职能承担起来。二元观仍然存在：公司依然被视为一种陌生的、有时怪异的梦魇，从心智上脱离了其他社会。它不为人们所理解和爱戴，甚至无法赢得人们的喜欢。

公司独立于社会主体之外，这种状况在一个可预见的、必然到来的、密切程度和密度不断提高的社会中是不可能一帆风顺地继续下去的。本书将讨论商业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基础，并提出一种人们更容易接受的逻辑理论。这种逻辑理论将把文明化内容引入公司及公司管理事物之中。

目 录

引 言	(1)
第 一 章 资本主义与丰饶的象征	(1)
第 二 章 资本主义与进步	(22)
第 三 章 资本主义与公平财产的观念	(44)
第 四 章 成功精神	(69)
第 五 章 信念精神	(84)
第 六 章 公司：偷猎者成为猎场看守者	(102)
第 七 章 利润最大化之利润	(118)
第 八 章 公司的文明	(138)
第 九 章 竞争的原则：宽容	(160)
第 十 章 竞争：商业制度的改革	(182)
第十一章 竞争和共同宗旨	(196)
结 束 语	(218)
注释和参考文献	(228)
译 后 记	(242)

第一章 资本主义与丰饶的象征

“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文化体系，它在经济上以财产制度和商品生产为核心，在文化上以交换关系即买卖关系渗透到几乎整个社会这个事实为基础。”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曾经说过，静态的封建主义是一个历史事实，一个静态的社会制度，一种历史可能性，但是静态的资本主义从修辞上来说是一个历史矛盾体。”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14、240页，1976年著）

“社会政治冲突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劳资之间的冲突；它将是养尊处优的财产拥有者与被剥夺者之间的冲突。”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经济时代的历程》，1994年著）

“迟早将袭击一个国家的心脏和大脑并使之毁灭的那种疾病是利己主义，是那种充分意识到个人或国家之间的竞争并攫取个人财富的利己主义。”这句话是列宁

说的还是斯大林说的？它既不是列宁说的，也不是斯大林说的，而是发明安全剃须刀的百万富翁金·吉列 1910 年说的。那时亨利·福特总不愿意看到自己同金·吉列之间出现严重分歧。

难道列宁或马克思说过：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挥霍自己的财产，毫无限制地奴役他人，迫使他们干“一切似乎对自己有利的工作”，是错误的吗？列宁没有，马克思也没有。口出此言的正是 20 世纪初德国富有影响力的著名企业家、腰缠万贯的瓦尔特·拉特瑙。

本章将讨论另一种资本主义和另一句格言，它们虽然发生在本世纪，但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资本主义取得了出乎意外的胜利

20 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化社会有 6 个特征：经济在经历了战前的多次失败之后取得了巨大成功；室内外生活条件的标准的提高；全球性联系；不同文化之间的可沟通性；转变和改造能力；此外，还有预见能力的有限性。

本世纪下半叶，开放的民主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和商业的需要，在西方、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其结果是，可能使民主受到损害的正是民主的这种过猛发展势头，而不是民主的缺乏。

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许多事件都在不断地赋予民主以新的内容。苏联及其附属国把马克思自己的“过渡性原则”（《哲学的贫穷》）抛置脑后。这条原则说“概念和范畴并不比它们所表述的关系更加永恒。

它们是历史性和过渡性产物。”

俄国自由主义者亚历山大·赫尔岑在 1850 年说，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将历经自己所有的发展阶段，最终走向极端，变得荒诞不经。“然后，将从少数派反叛者的巨大胸膛里爆发出一声断然拒绝的呐喊。随之将再次出现一场道德方面的论战。”⁽¹⁾

就在 1941 年德国进攻苏联前夕，即距苏联解体大约 50 年前，美国政治家詹姆斯·伯纳姆说，尽管苏联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但是其弱点则更加突出。苏联工业的落后局面不能仅仅通过其质量低下的有形设备来衡量，还必须通过其合格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相对匮乏来衡量。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可能使这个新的国家机器产生出一批极其卑鄙的野心家。他认为，官僚主义的贪婪、腐败和不折不扣的愚蠢在俄罗斯普遍存在：他得出结论说，这些弱点将足以表明，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²⁾。这个预言最终变成了事实。

道德革新的世纪

这个世纪是道德大革新的时代。尽管个人行善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但是国家之间的善举还是全新的事物。尽管殖民主义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国际援助无论如何都将给它致命一击：因为殖民思想与国际援助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出于历史的必然，国家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正好与商业的国际化 and 跨国性质同时应运而生。

“马歇尔计划”从许多方面改变了 20 世纪的世界面

貌，但是人们几乎已经忘掉了在该计划诞生之前出现的一个仁爱征兆：⁽³⁾1921年，新生的苏联笼罩在饥饿的阴影之下。是年7月，时任哈定总统商务部长的反共人士赫伯特·胡佛接到了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个人请求。令人吃惊的是，他迅速作出了反应。俄罗斯的“各个城市里到处都是饥饿的人群。仅在彼得格勒，每个月就有多达10万人因饥饿而挣扎在死亡线上。可是现在，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粮食资源；但是一个不称职的官僚政府却不能向需要粮食的地方提供粮食。新生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触目惊心的饥荒，它以乌克兰和伏尔加河流域为中心，向四周蔓延。这场饥饿部分是由于怪异的天气引起的，但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陷入停顿而引起的，因为苏维埃政权正在迫使农民走共产主义道路。列宁当时写道，如果没有国际援助，‘政府将灭亡’”。

“胡佛回顾道：‘在（美国）国内，我们正在史无前例地大把大把花钱。因为我们所征税收之多，也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面临着失业问题，我们还面临着解除全国战备状态以后军人复员所带来的所有问题。我们的人民呼吁……冻结这种援助开支。’但是，美国的大规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截止到1922年春，1800万俄罗斯人有了粮食吃。”在美国，大约200名具有救援工作经验的志愿人员被召集起来。在高峰时期，约有600名美国人参加了援救工作。美国救援机构雇用当地的苏联工作人员负责把救援物资通过铁路从海港运送到全国的各个分发地点。而美国的工作人员则对他们进行监督。最后，救援工作建立了一个由1.8万个分配站组成的分配网络，总共提供了7亿吨粮食，还有大量药品和商品。

这些物资足够 1800 万俄罗斯人吃用 3 年，并拯救了 1000 万至 2000 万生命。

后来，马克西姆·高尔基给胡佛写信说：“据我所知，在人类全部的苦难历史中……没有任何成就能够在规模和慷慨程度上与您所提供的救援工作相提并论……您的帮助将作为独一无二的巨大成就载入史册，无论怎么称颂也不会过分，并将永远铭记在千百万俄罗斯人民的心中……您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但是斯大林却采取了措施，使这个壮举没有保留在千百万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的俄罗斯人的心中。

还是在俄罗斯，从 30 年代初开始，在经济方面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先例，当时欧洲提出把欧洲单一货币单位——暂且称之为“欧元”——作为统一货币。欧元既不是马克，也不是法郎、里拉、弗罗林或英镑，而是（至少刚开始时是）所有这些货币单位和其他一些货币单位的一种综合尺度。在 30 年代，中国东部铁道的所有权虽然归苏联和中国双方共同所有，但是由苏联管理。可是，苏联那种我行我素的管理方式对任何一种当地货币都持不信任态度。它于是便发明了自己的货币“金卢布”。金卢布既不是黄金，也不是卢布，而是美元、英镑、瑞士法郎等著名货币的平均尺度。⁽⁴⁾

但是最早（1758）和最具意义的预言是戴维·休谟的预言。休谟质问：当工资较低的不发达社会学会模仿先出现的社会和先进社会的“机械艺术”时，“国家的相对优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由于具有惊人的预见能力，休谟早在工业化浪潮席卷英国等沿海国家很久以前就提出了这个疑问。W.W. 罗斯托说：“考虑到商人要

把后来者掐死于摇篮之中的本性，休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先行者如果维持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就能享受到发展双向贸易所带来的优势；但是如果要在不可避免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按休谟的话说——（他们）就必须‘勤奋和文明’。”⁽⁵⁾

“旧的秩序发生了变化，让位于新的秩序”

本世纪的主要创新之一是资本主义具备了现代特征。

在本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上半叶，政治经济和商业的价值和观点与我们现在的观点大相径庭，发现这一点的不但有学术研究人员，而且也有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我们的资本主义。

大规模生产所创造的奇迹对他们的观点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们看来，大规模生产——又称“工厂制度”、“机器制度”、“生产主义”或“生产效率主义”——是一个具有魔力的新发现。它揭示出：贫穷国家的需求可以通过物质极大丰富的工业前景来满足。因此，大规模生产是为博爱服务的。

但是，我们不会用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来取代我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因为我们将看到，一些人认为，柏拉图式的严厉监护制度与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西斯主义非常相似。

学术界的第一个见证人是索尔斯坦·维布伦（1857-1929）。人们可能已不大记得维布伦这个人，但对他创造的“夸耀性消费”和“夸耀性浪费”这两个词却铭

记在心。我们之所以记住了这些词语，是因为相对于维布伦时代而言，它们在今天具有更大的力量。那个时代属于夸耀性的东西如今则变成了具有危险性的东西。

维布伦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是挪威人的后裔。他的英语始终带有挪威语的那种轻快节奏，一生都没有改变。正如他的一位非常要好的评论家所言，维布伦自始至终是一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问者”。在他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愿意接受他的观点，因为他是一位“访问者”，因为他经历过一场失败的婚姻，因为他违背了其他的社会主流举止等等。他在晚年时获得了荣誉，但是与现有社会格格不入这条线索始终贯穿着他两部最重要的资本主义批判作品：《有闲阶级论》（1899）和《企业论》（1904）。

他说，“工业”或“机器制度”要求纪律、社会服从和效率。这与经济控制这种古老的野蛮行为是不可调和的。“压制机器制度将把企业逼至绝境；而如果让机器制度自由发展，企业经营原则就会马上陷入停滞不前。”⁽⁶⁾他说，无论是停止不前还是继续前进，结局都是毁灭。

“机器制度”是维布伦时代的关键概念，也是另一位敏锐观察家格雷厄姆·沃拉斯 1914 年提出的一个根本概念。沃拉斯（1858 - 1932）是英国人，他和维布伦属于同一个时代，但他作为一位充满希望、富有爱心的社会主义温和派人士，持有不同的观点。不过，他和维布伦一样，也是怀疑论者，他撰写了《论政治学中人的本性》（1908）和《伟大社会》（1914）这两部著作。他意识到机器制度对文明产生的影响，并感到建立庞大的令

人满意的群体组织是不可能的。由于“聚敛财富的本性没有任何明确的界线”，我们必须最终选择要么生活在较小的社会里，要么生活在较大的社会里，在享受其好处的同时容忍人们经常发出对人际关系的不满。⁽⁷⁾

大约 30 年后即 1942 年，另一位观察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 - 1950）撰写了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捷克裔奥地利人熊彼特是一位坚定的反社会主义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担任过奥地利的财政部长，但任职时间不长。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熊彼特仍然把我们的社会视为由强大的大规模生产企业组成的文明社会，是一个财富分配不均、自愿接受失业的社会。他说，这种文明是注定要消亡的，不是因为它的过错，而是因为它的优点和它在“毁灭创造性”时取得的成功。他坚持认为，收入增加削弱了企业家的地位，并使他们的人数出现了过剩。他们的地位被官僚们取而代之。与维布伦不同的是，他认为“资本家的活动从根本上来说是‘理性的’活动，它们趋向于传播符合理性的心理习惯并摧毁其下属的……那些习惯……这些习惯对生产工作领导层……有效工作是必需的……”。一个愤愤不平的知识分子阶级出现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充满仇恨。资本主义削弱了家庭的地位。但是资本主义本身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削弱。政府可以采取干预措施，实现收入平等化，并采取措施以确保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毁灭资本主义的正是这些政策本身。因此，社会主义最终将替代资本主义。

熊彼特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价值结构、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明——不平等和家庭财产的文明”。⁽⁸⁾总

的来说，这有点言过其实：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价值结构”，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个关键程序、一个价格和分配体系。资本主义是文明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主要部分，也不是全部。资本主义是一个定义，但它本身却无法定义。我们将在以后再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来看看企业家的观点，他们中较为突出的有瓦尔特·拉特瑙、老亨利·福特、金·吉列和欧内斯特·索尔维。

瓦尔特·拉特瑙：“经济是命运”

瓦尔特·拉特瑙的父亲埃米尔（1838 - 1915）创立了德国的爱迪生公司并在 1887 年把它更名为通用电气公司。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英国通用电气公司（但彼此没有隶属关系）齐名。他还和维尔纳·冯·西门子一起共同打下了西门子公司和德律风根公司的基础。瓦尔特（1867 - 1922）在 20 世纪初从他父亲手中接过董事长职务，并把通用电气公司塑造成一个庞大的公司帝国。他把德国工业的战时供应政策演变成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行动（他凭借手下的三个机构使自己的力量增长了 3 倍，这些机构分工协作，其威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希特勒要强大得多）。拉特瑙在战后担任重建部长。1922 年，已成为德国外交部长的瓦尔特被法西斯分子枪杀；他们愚蠢而错误地认为，他们谋杀的是犹太世界公民、坏蛋瓦尔特·拉特瑙，而事实上他们谋杀的是德国爱国者、好人瓦尔特·拉特瑙。涉嫌谋杀拉特瑙的罪犯之一、作家欧内斯特·冯·所

罗门因此悔过自新，后来变成了和平主义者。

拉特瑙本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他对资本主义持既欢迎又批评的态度。与他同时代的一位见证人认为，尽管他是“75%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仍然是一位贵族和民族主义者”。⁽⁹⁾拿破仑认为“命运即政治”，拉特瑙则不同，他认为“经济即命运”。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领袖都认为，经济和大规模生产是建设美好未来的关键。当时的知识中产阶级也许会拒绝接受共产主义理论，但是拉特瑙等资本家只是拒绝接受它的某些纲领。

他在1918年写下了这句话：“如果我们每年花20个亿到30个亿买酒喝，耗资亿万购买饰物、看演出和购买个人首饰，让成千上万名体格健全的售货员呆在大城市的商店柜台里无所事事，或是让数十万商人年复一年地坐在奔驰的列车里浪费时间，在同行之间展开竞争，临到年末却发现每家公司的销售量与上一年不相上下——那么，我们将把国民的储蓄挥霍得一干二净，把整个生产过程引入歧途，分散劳动力，浪费物质资料，阻碍资源的流通，增加生产成本，并减少外部竞争。”⁽¹⁰⁾

他对小公司持不信任态度：“提高经济伦理道德水平的第一个小措施是，非个人（主要由公众持股的）公司证明没有股份集中的（小）公司那么多的欺诈和虚假广告。”

他在另一部书中继续论述这个问题时说，大公司的经理们“即使在与企业脱离关系很久以后也在为时代谋福利”。“如果要他们在增加一倍薪水和担任经理即企业高级官员之间作出选择，他们将选择责任，而不会选择